



# 民商事诉讼实务前沿

2025年4月刊

上海市律师协会  
民商事诉讼专业委员会  
编委会

王正 关峰 彭筱剑 施磊  
叶茵茵 张洁 崔萍 李文玲  
冷亚娜 孙斌 刘路 李慕时  
许谦 蒋烽 李文华 张春球  
张炳栋 吴阮超 张磊

# 目 录

## • 新规速递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3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规范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5

## • 业务动态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8
- 重庆法院2024年度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19

## • 实务研究

- 利益衡量如何在民商事案件中展开? .....29
- 应收账款被抢先登记, 征信机构有责任吗? .....36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4月25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463381.html>

#### 法释〔2025〕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25年3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4月25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4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28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就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有关问题，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下列民事案件，由军事法院管辖：

- (一) 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 (二) 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涉及军事秘密的案件；
- (三) 侵权行为发生在营区内的侵权责任纠纷，且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 (四) 军队聘用制文职人员与军队单位发生解除或者终止聘用合同争议，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依法提起诉讼的案件；
- (五) 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或者死亡的案件；
- (六) 申请认定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以及相应的指定监护人的案件；
- (七) 军队设立选举委员会的选民资格案件；
- (八) 认定营区内无主财产案件。

军事法院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一项受理民事案件后，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追加地方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由军事法院继续审理。

第二条 下列民事案件，有关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地方当事人向军事法院提起诉讼的，军事法院应当受理：

(一) 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二) 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三)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不动产所在地、港口所在地、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在营区内，且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四) 地方当事人与军队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一方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且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在营区内的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书面约定军事法院管辖，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和专门管辖规定的，应当由军事法院管辖。

第四条 军事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

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可以受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或者处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管辖，但本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案件除外。

第五条 军事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地方人民法院，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处理，不得再自行移送。

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法院管辖的，参照第一款规定办理。军事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参照第二款规定办理。

第六条 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依照本规定第五条移送管辖之前，可以先行协商。

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通过会商机制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商解决；仍然协商不成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第七条 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军事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军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军士、义务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警官、警士、义务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军队中的文职人员、由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具有军队编制的职工，参照军人确定管辖。

军队单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

营区是指由军队管理使用的区域，包括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以及军队设立的临时驻地等。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同时废止；本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规范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4月26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5/04/id/8811268.shtml>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规范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本院各单位，驻院纪检监察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党中央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规范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积极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以严格公正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实际，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做实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做到合法权益依法平等保护、违法犯罪依法追究。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法律适用一视同仁，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一律依法惩治。对于涉企案件，要在严格依法审判基础上，综合考虑案件具体情况，从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依法作出恰当处理。

2.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严格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参与兼并重组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正当经营与违法犯罪等的界限，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有效防范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司法。对在生产、经营、融资等活动中的经济行为，虽属违法违规，但不构成犯罪的，依法宣告无罪，或者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对于涉企新类型案件，应当依法审慎处理，必要时由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提级管辖。强化涉企产权刑事案件申诉、再审工作，健全有效防范、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

3.规范涉企案件立案和管辖工作，防止和纠正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落实立案登记制不动摇，依法保障当事人诉权，坚决杜绝拖延立案、违规不立案、限制立案、选择性立案等问题。坚持法定管辖为原则、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为例外，严禁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或者出于趋利性目的，对涉企案件扩张管辖、人为制造异地管辖，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对依法应当立案的涉企民事案件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或者下级法院提请指定管辖的，有关法院应当严格审查、依法处理，从源头上防止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司法。

4.依法规范适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失信惩戒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动的影响。严禁超权限、超范围、超标的、超时限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善用“活封活扣”措施，对于能“活封”的财产，尽量不进行“死封”，使查封财产能够物尽其用。精准适用失信惩戒措施，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及时核查清理失信信息，依法依规做好信用修复，让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企业重返市场、创新创业。

5.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实定分止争。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善于运用“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公正高效化解涉企民事纠纷。严格规范涉企民事案件的立案与调解工作，充分释明先行调解的优势，引导尽可能通过先行调解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对调解不成的，依法及时予以审理裁判，坚决杜绝强制调解、久调不决、以调压判等违反调解自愿原则情况的发生。

6.公正审理涉企民事案件，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支付款项为付款前提条款效力问题的批复》，防止大型企业凭借优势地位“以大欺小”，保障中小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依法制裁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依法惩治对企业和企业家进行敲诈勒索、造谣抹黑、恶意诋毁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行为，保障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7.公正审理涉企行政案件，促推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对涉企市场准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赔偿等重点领域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力度，坚决纠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和乱查封现象，坚决依法追究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法律责任。贯彻落实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基本原则，切实纠正小过重罚、重责轻罚、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和裁判尺度，通过依法审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提出司法建议等方式，促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裁量权行使，推动跨区域执法标准衔接。

8.强化民、行、刑程序衔接，确保案件办理效果。落实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工作要求，对于涉企民事、行政案件，经审查认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机关处理。对于涉企民事案件无需以刑事案件裁判结果为依据的，不得以刑事案件正在侦查或者尚未审结为由拖延民事诉讼。对于涉企刑事案件，经审查认为依法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依法宣告无罪，或者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对于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9.严格规范涉案财物追缴处置，依法维护企业产权。对于被告单位的合法财产以及与犯罪活动无关的财产及其孳息，符合返还条件的，应当及时返还。涉案财物已被用于清偿合法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善意案外人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支付合理对价，并实际取得相应权利的，不得追缴或者没收。对于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聚敛、获取的财产形成的投资权益，应当对该投资权益依法进行处置，不得直接追缴投入的财产。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10.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坚持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并举。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联动，依法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充分发挥中止执行、停止计息等制度功能，及时保全债务人财产、阻止债务继续膨胀，帮助具有挽救可能和价值的企业恢复生机、重返市场。在破产程序中探索推动一体解决企业家为企业债务提供担保问题，有效化解企业债务链条。依法有序出清僵尸企业，释放、盘活市场要素资源，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各级人民法院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要求，立足人民法院职能职责，聚焦涉企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扎实有序开展专项行动。既要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等的协作配合，强化工作沟通，增强工作合力，协同解决涉企执法突出问题，又要严格履行人民法院法定职责，依法互相制约，依法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各类涉企案件公正、妥善处理。要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保障、引领的重要功能，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5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4月7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1MjUzOTY%3D?searchId=587e976e55e441518f981ebba96084c&index=6&module=&childModule=all&q=>

#### 法〔2025〕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四川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执行实施案等六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51-256号），作为第45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办理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4月7日

#### 指导性案例251号

四川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执行实施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4月7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实施/知识产权/提级执行/执行和解

#### 执行实施要点

1.行为类执行案件中，存在被执行人继续实施所涉侵权行为、涉及多起跨区域重大关联案件、需要上级人民法院统筹协调等情形，导致案件自执行立案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完毕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提级执行、督促执行等方式，推动案件执行。

2.对于拆除涉知识产权侵权生产设备等行为类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在充分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引导双方达成和解，以被执行人支付技术许可使用费等形式代替拆除相关生产设备，促进相关生产设备的合法利用，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 基本案情

四川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民事判决：山东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某化工公司）等立即停止销售使用四川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某化工公司）的案涉技术秘密生产的三聚氰胺产品、销毁项目中案涉设备（销毁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有关设备中包含案涉技术秘密的部分）和持有的案涉技术秘密资料，并连带赔偿四川某化工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



支人民币9800万元(币种下同)。因山东某化工公司逾期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四川某化工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由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负责执行。执行过程中,经过网络查控、划拨,金钱给付义务强制执行完毕,但判决确定的停止销售侵权产品、销毁侵权设备及技术资料的行为义务,被执行人一直未主动履行。并且,销毁案涉生产设备的难度极大:设备涉及上万个精细零件,不易精确锁定拆除范围;设备具有易燃易爆属性,操作不当易引发严重化工污染;国内具备相关拆除资质的公司极少,且从未有过类似拆除作业的先例;设备地处外地,需要进行跨区域协调。同时,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存在3起关联案件,均系由本案所涉侵权行为引发的纠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行为义务与本案相同,被执行人亦未履行;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诉讼标的高达6亿元。

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本案予以督办,对本案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执行进度节点,进行统一指挥、调度、管理;牵头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提级执行等执行方案,根据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同时结合本案的特殊情况,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明确“一揽子”解决当事人在四川、广东共计4起关联案件的执行工作思路。之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提级执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及山东省相关部门多次召开座谈会,引导当事人最终达成包含被执行人支付技术许可使用费、侵权赔偿款、案涉设备继续生产经营等主要内容的执行和解协议。

### 执行结果

2024年1月28日,四川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达成和解并签订协议,“一揽子”解决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1起案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的2起案件。2024年8月,山东某化工公司将和解协议约定的4.4亿元全部汇入申请执行人指定账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3)川01执4918号通知书,本案执行完毕。

### 执行理由

本案为知识产权领域行为类执行的疑难复杂案件,采取何种执行方式和策略引导、促成执行和解,推动矛盾纠纷“一揽子”化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是推动本案依法妥善处理的关键。

其一,关于执行方式。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上级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限期执行,也可以指令辖区内其他人民法院执行或者直接提级由本院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下级法院长期未能执结的案件,确有必要的,上级法院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与下级法院共同执行,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法院执行。”本案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广东、四川另有3起重大关联案件,申请执行人向法院表达了希望一体化解所有纠纷的意愿。同时,

被执行人与侵权设备均在外省，强制拆除案涉生产设备专业要求高、国内没有拆除先例、安全风险大。因此，依靠原执行法院的力量，开展跨省、跨部门协调显然具有较大难度，难以保障执行的效率和效果，有必要通过提级执行等方式，推动案件顺利、高效办理。

其二，关于执行措施。作为执行依据的（2022）最高法知民终541号民事判决明确，销毁有关设备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拆除。从本案的具体情况看，简单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非最佳方案。案涉设备具有易燃易爆属性，拆除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操作不当会引发严重化工污染；强制拆除案涉设备将导致企业生产经营难以为继，且会影响相关产业链，对企业生存、职工就业和当地经济发展都会造成一定影响。而案涉生产设备具有可持续生产的条件，不属于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如能得到许可，则可以合法继续使用，有利于实现物尽其用，既能维护侵权企业的生存、保障企业职工就业，也能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显然都更好。并且，通过支付侵权赔偿款并就继续实施支付技术许可使用费，从而取得合法使用有关技术设备的授权，同样能够实现裁判要求和维权目的，是技术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需要特别注重采取的执行措施。鉴此，人民法院加强协调，通过多方联动、多案协同等方式，找准利益平衡点，引导双方达成和解，通过协商确定技术许可使用费等，为权利人提供依法收取技术许可使用费的“积极价值”，代替强制拆除侵权设备的“消极价值”，促成案涉生产设备合法、持续利用。

###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74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3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8条

### 指导性案例252号

浙江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系列执行实施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4月7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实施/指定执行/执破衔接

### 执行实施要点

1.同一被执行人涉及多起执行案件，不同人民法院已分别立案执行，由一个人民法院统一执行便于依法及时有效开展执行工作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其中一个人民法院统一执行。

2.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企业进入预重整程序的，可以将案件指定至具有破产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统一执行，推进执破衔接。

### 基本案情

2017年9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浙江萧山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发支行（以下简称某银行银发支行）与浙江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12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调解书进行立案执行，执行标的约人民币1亿元（币种下同）。执行过程中，双方曾达成分期履行

和解协议，但被执行人未全部履行付款义务。经某银行银发支行申请，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立案恢复执行，继续查封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被执行人的车辆、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并启动对被查封财产的评估程序。某银行银发支行对前述被查封的厂房享有抵押权。

2021年8月，因行政区划调整，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被执行人所在地从杭州市萧山区划入杭州市钱塘区。2022年，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3件涉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但因公司财产均被萧山区人民法院查封，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均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后，钱塘区人民法院又陆续受理上百件浙江某新材料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劳动争议案件。由于在行政区划调整前，有28件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主要资产亦被萧山区人民法院首次查封，且正在处置过程中，导致钱塘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该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劳动争议系列执行案件陷入僵局。

此外，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六家关联企业总负债40亿余元，已资不抵债，并已向钱塘区人民法院申请预重整。

为“一揽子”解决该系列案件执行问题，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将萧山区人民法院正在执行的上述28件案件指定由钱塘区人民法院统一执行。

钱塘区人民法院出于执破衔接的工作考虑，对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被执行人的案件开展全盘梳理，并召集被执行人、债权人代表、职工代表座谈。经调查，该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关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行业前景较好，潜在偿债能力较强，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

### 执行结果

2024年1月22日，钱塘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浙0114破申2号民事裁定：受理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在重整程序中，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企业依法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对职工工资在内的7000余万元债权清偿进行安排，并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2024年6月18日，钱塘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浙0114破1-6号之二民事裁定：批准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六家关联企业的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

### 执行理由

本案中，被执行人涉及多起案件，不同人民法院已分别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资不抵债，又向人民法院提出预重整申请，如何依法统筹推进、稳妥办理系列执行案件，如何协调执行程序与预重整程序的关系，需作特殊考量。

其一，以指定一个人民法院统一执行的方式有效推进执行工作。通过指定执行，将原属不同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同一被执行人系列案件集中至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执行，能够有效解决因多头执行、强制措施重叠、执行思路不一导致的“执行难”等问题。本案中，涉及浙江某新材料公司等被执行人的主要债务及抵押权债务的多个案件在萧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因行政区划调整，后有多起劳动争议案件在钱塘区人民法院执行，且浙江某新材料公司向钱塘区人民法院提出了预重整的申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钱塘区人民法院统一执行有关系列案件，可以整合资源，在保障各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统筹预重整阶段的协商谈判，帮助被执行企业摆脱困境、实现重生，更好地实现涉企执行案件的清理与市场主体的有效救治。

其二，畅通执破衔接机制，助力企业再生。对于经营困难企业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可以通过加强立审执协调等措施，分类施策，推进执破衔接。对于资不抵债且确无救治必要和可能的企业，依法适用破产清算

程序，及时进行出清；对于一些有潜力、有前景的企业，应当尽力通过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等方式帮助企业化解危机。本案中，浙江某新材料公司虽然已经资不抵债，但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相关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行业前景较好，潜在偿债能力较强，具有挽救价值，有关预重整方案也已经得到多数债权人支持，具备重整可能。依法适用破产重整，不仅有助于该公司造血重生，也能最大限度公平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减少债权实现的综合成本，有利于实现最佳办案效果。

###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74条第2款

### 指导性案例253号

惠州市某实业有限公司与惠州市某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丘某炎执行实施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4月7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实施/指定执行/执行和解

### 执行实施要点

1.因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等因素导致执行工作不能有效推进，由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更便于依法及时有效开展执行工作的，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将案件指定由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执行。

2.被执行的财产涉及民生工程，且需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协助配合的，人民法院可以加强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引导各方达成分期履行等和解协议，保留必要资金维持民生工程正常运转。

### 基本案情

2023年3月，惠州市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某实业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惠州市某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某净化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丘某炎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1041万余元（币种下同）及相应利息。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分期付款调解协议并经民事调解书确认。因惠州某净化公司、丘某炎未履行付款义务，惠州某实业公司向惠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惠城区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惠州某净化公司和丘某炎的财产进行调查查明，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账户内有少量存款，被执行人惠州某净化公司注册地位于惠州市惠阳区，被执行人丘某炎名下登记的四处不动产亦均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惠城区人民法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名下银行账户及丘某炎名下的上述不动产。经惠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指定由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执行。

执行过程中，经调查核实，被执行人丘某炎名下登记的四处不动产均设立了抵押权，且不动产的价值明显不足以覆盖抵押权人的债权，对其拍卖属无益处置；被执行人惠州某净化公司承接政府污水处理工程，负责惠阳区淡水城区60%的污水处理，享有应收工程款的债权。该工程款由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



简称惠阳区住建局)按月分期支付到被执行人惠州某净化公司已被冻结的银行账户,但案外人惠州某商业银行惠阳支行(以下简称某银行惠阳支行)对上述应收工程款享有质押权。被执行人用接收的工程款维持企业经营、推进污水处理工程,并按月偿还质押权人某银行惠阳支行的债权。在惠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冻结惠州某净化公司接收工程款的账户后,申请执行人惠州某实业公司多次申请强制执行该工程款。惠阳区住建局认为,若强制执行该工程款,将直接影响企业污水处理工程进度,进而影响淡水城区近20万居民的正常生活,亦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为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保障居民正常生活,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维护质押权人合法权益,惠阳区人民法院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质押权人进行协商,引导双方当事人于2023年7月达成执行和解。和解协议约定:在保障惠州某净化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确保相关污水处理项目正常建设及质押权人债权按月受偿的前提下,由惠阳区人民法院按月分4期逐步扣划惠州某净化公司银行账户内的应收工程款共计967万元,并发还给惠州某实业公司;惠州某实业公司同意放弃对利息的追偿,并同意解除对惠州某净化公司名下银行账户的冻结和丘某炎名下不动产的查封。

### 执行结果

2023年10月,惠州某实业公司收到最后一笔款项,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本案以执行完毕结案。

### 执行理由

本案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在外地,且涉及民生工程,为保障执行工作顺利推进、稳妥开展,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统筹协调。

其一,由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更有利于推进执行工作的,可由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对于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案件,为更加有效推进执行工作、保障胜诉人合法权益,可以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由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本案中,惠城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发现被执行的财产均在惠阳区,遂报请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执行。出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的考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指定由惠阳区人民法院执行。

其二,被执行的财产涉及民生工程的,人民法院应当妥善处理。本案中,惠阳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的工程款涉及当地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强制执行可能影响污水处理工程项目进度,进而影响当地居民正常生活乃至生态环境。惠阳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属地法院优势,一方面积极协调住建部门配合法院推进案款执行工作,另一方面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质押权人进行协商,释法明理,引导各方寻求利益平衡点,最终达成分期支付工程款的和解协议。

通过指定执行并积极协调有关方面,本案既最大限度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为被执行企业争取了发展空间,同时保障了有关民生工程顺利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

###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74条第2款



**指导性案例254号**

厦门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与福建某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财产保全扣划实施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4月7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财产保全扣划实施/自动履行/审执衔接

**执行实施要点**

裁判生效后、立案执行前，被保全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扣划其已被保全的款项用于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对于不存在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作出扣划裁定；通过上述程序债务得以全额清偿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被保全人出具自动履行证明。

**基本案情**

在厦门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某健康公司）与福建某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某体育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中，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依厦门某健康公司的申请，于2024年7月24日裁定保全福建某体育公司价值人民币27万余元（币种下同）的财产，其中19万余元系银行账户资金。2024年10月24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福建某体育公司向厦门某健康管理公司支付7.5万元款项。随后，福建某体育公司提交书面申请，表示愿意主动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并以保全账户资金足以履行债务且无其他周转资金为由，请求人民法院直接扣划其保全账户内的资金用于清偿案涉债务。厦门某健康公司对此履行方式无异议。

经查，福建某体育公司无其他涉及诉讼和执行的案件，其保全扣划申请不存在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海沧区人民法院依法准许福建某体育公司的申请，并作出扣划裁定，裁定载明本案财产保全实施情况、调解书履行内容和期限、当事人申请及保全账户已控制资金等情况。

**执行结果**

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4日作出（2024）闽0205民初4139号民事裁定：划拨、提取福建某体育公司名下被保全的银行账户资金共计7.5万元。2024年10月29日，海沧区人民法院通过执行保全案件对福建某体育公司被保全账户实施扣划，将全部款项发放给厦门某健康公司，并向福建某体育公司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

**执行理由**

对于被保全的款项，人民法院在作出生效裁判后、立案执行前，可以依法对该款项作出扣划裁定（以下简称为执行立案前保全扣划措施）。这种措施可以使债权人在不解除保全措施的情况下尽快实现债权，债务人亦可在不产生执行成本和不影响征信的情况下履行债务，符合双方的利益需求，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在操作中需要强化审执协同，并注意防范可能存在的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其一，执行立案前采取保全扣划措施，有利于充分发挥财产保全的制度功能。财产保全制度系通过限制被保全人对其财产的处分，实现对债权人诉讼利益的保障，制度要旨在于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履行。

将保全财产用于偿还债务，通常也只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解除保全措施后再由债务人履行相应义务，二是待判决生效后由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前者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履行的风险，后者会影响权利人利益的及时实现，也会造成债务人的信用减损。事实上，被保全人自愿履行并申请人民法院扣划保全款项，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符合保全制度宗旨，有利于推动生效法律文书的自动、及时履行，最大化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执行案件、节省执行成本，因此，执行立案前，对被保全人申请扣划保全款项用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存在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情形的，可以准许并扣划被保全人相应款项。通过上述程序债务得以全额清偿的，人民法院可以向被保全人出具自动履行证明。

其二，执行立案前采取保全扣划措施，应当严格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是否存在虚假诉讼、个别清偿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风险。当事人申请在执行立案前采取保全扣划措施的，应当向其释明虚假诉讼等恶意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法律后果，并要求其提交承诺书；受理当事人申请后，要主动检索、核查债务人涉诉涉执案件情况，若发现债务人有其他涉诉案件或者执行案件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在不影响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审慎决定是否采取相关保全扣划措施。

###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6条

### 指导性案例255号

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明某执行实施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4月7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实施/抗拒执行/风险预告/自动履行

### 执行实施要点

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向其发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风险预告，告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督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

### 基本案情

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明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020）甘0503民初2444号民事判决：明某腾空、返还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案涉房屋，并支付相应房屋占用费、物业费等。宣判后，明某不服，提起上诉。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8日作出（2021）甘05民终58号民事判决：维持腾空、返还房屋的判项，同时对房屋占用费、物业费等数额作出调整。判决生效后，明某拒不履行。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向麦积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麦积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7日向明某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通知其限期腾退案涉房屋，并支付执行款。期限届满，明某拒不腾退。后麦积区人民法院又张贴腾房公告，责令明某在指定的日期前腾退房屋，明某仍拒不配合执行，并纠集家属亲友围堵执行现场，引起数十名群众围观，致使

执行工作无法进行。为维护执行权威，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麦积区人民法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风险预警的形式正式告知明某，向其发出“惩戒警告”，告知其拒不腾退房屋的行为已经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其在指定的日期前仍不腾退涉案房屋，人民法院会依法将其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同时，法院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将明某投入的天然气安装费折抵部分房屋占用费。

### 执行结果

明某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日期前将案涉房屋腾空并移交给天水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全部支付折抵后的房屋占用费、物业费等。2021年10月21日，麦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甘0503执732号结案通知书，本案执行完毕。

### 执行理由

本案处理的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措施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其一，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严格规范执行，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据此，对于发生法律效力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当事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并视情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依法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胜诉当事人权益的手段。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治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抗拒执行行为，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其二，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要注重规范文明执行。强制执行应当公平、合理、适当，兼顾各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避免过度执行。本案中，明某拒不履行判决义务，不配合腾退涉案房屋，并纠集家属亲友围堵执行现场，对抗人民法院执行，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人民法院基于规范文明执行的考虑，向被执行人发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风险预警，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预先告知明某，并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明某虽然前期存在拒不履行的行为，但在被预告法律风险后，出具履行承诺，并在指定的日期前腾空并移交涉案房屋、支付相关费用，综合考量其情节，不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该执行工作方法有力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实现了良好的执行效果。

###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6条）

### 指导性案例256号

重庆某实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潘某执行实施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4月7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实施/大量车位/业主优先/分零拍卖

### 执行实施要点

人民法院处置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大量车位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首先满足小区业主的需要，综合考量所涉车位性质、小区车位配比、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分零拍卖等处置方案。

### 基本案情

重庆某实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潘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7日作出（2021）渝0192民初442号民事判决：重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建筑公司）向重庆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实业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33.05万元（币种下同）及相应资金占用费126.69万元；潘某对重庆某建筑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被执行人重庆某建筑公司、潘某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重庆某实业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向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首次查封了被执行人潘某名下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某小区的车位，共计73个。案涉车位所在的小区建成于2004年，小区有5栋楼房，共计445套住房，住房与车位配比约为1:0.3。案涉73个车位均为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位处于承租人租赁使用状态。案涉车位由被执行人潘某于2009年一次性购买取得。潘某目前并非小区业主。车位被查封后，被执行人仍未履行义务，重庆某实业公司向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申请进行处置。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的立法精神，为首先满足业主需要，同时确保案涉车位能够顺利拍卖成交，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决定，在车位整体拍卖和分零拍卖两种处置方式中优先采用分零拍卖的处置方式，并在具体实施方案上作了进一步细化。具体而言：（1）针对小区业主开展拍卖，每户业主只能竞买一个车位。若仍有车位流拍的，针对不特定竞买人再次开展拍卖；（2）作为车位承租人的业主符合竞拍资格的，在同等条件下对租用车位享有优先购买权。

### 执行结果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5日作出（2022）渝0192执737号之八执行裁定，对73个车位进行拍卖。在针对小区业主的拍卖过程中，案涉车位成交61个，成交均价为8.53万元，剩余车位在针对不特定竞买人拍卖过程中全部成交，成交均价为8.46万元。成交后，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完成相应车位的过户手续。拍卖案款扣除相应税费后，已全部支付给申请执行人。

### 执行理由

本案依法规范执行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置案涉大量车位。

其一，车位的处置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该规定体现了对业主权益予以优先保护的立法价值取向。本次司法处置涉及大量车位，应当根据上述立法精神，综合考量案涉车位性质、小区车位配比、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因素，制定合理的处置方案，既要实现财产价值最大化、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落实民法典相关规定精神，依法保障大量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

其二，关于对案涉车位进行整体拍卖还是分零拍卖的问题。本案中，小区的住房与车位配比约为



其二，关于对案涉车位进行整体拍卖还是分零拍卖的问题。本案中，小区的住房与车位配比约为1:0.3，车位紧张，且拟拍卖车位均处于由小区业主租赁使用状态。从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角度出发，对案涉车位的处置宜采取分零拍卖的方式。如果进行整体处置，通常只有一个竞买人竞买成功，即便该竞买人是业主，也将导致大量车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难以得到保障，大量无车位业主的购买车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其三，关于竞买人范围和顺序的问题。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仅包括业主对车位享有优先购买、优先承租以及优先使用等权利，还蕴含当业主的合理需求未被满足时，不能将车位任意处置给业主以外的第三人。当然，在“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基础上，应当准许将车位出售给业主以外的第三人，既有利于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也避免对被执行人权益造成不必要影响。因此，在具体拍卖环节上，优先由小区业主参与竞买，拍卖流程结束后，有流拍车位的，再针对业主以外的不特定竞买人开展竞拍，兼顾保护小区业主、胜诉当事人与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6条



## 重庆法院2024年度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来源：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5年4月13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DfhkCa1L-IIUhAdtbVYbQ>

2024年，重庆法院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职能，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在依法全面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服务保障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总结商事审判工作经验，发挥典型案例在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统一商事审判裁判尺度上的积极作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评选出重庆法院2024年度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 陈某与某信托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 【基本案情】

2013年10月24日，某信托公司与某汽车销售公司、某科技公司、深圳某建筑公司、佛山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某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募集资金8.2亿元，用该资金向某汽车销售公司、某科技公司持股的佛山某房地产公司增资，并登记某信托公司为佛山某房地产公司股东。该增资款用于偿还佛山某房地产公司对外债务，待债务还清后，将佛山某房地产公司名下随前述债务清偿而解除抵押或查封状态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至某信托公司名下，后由深圳某建筑公司无条件回购某信托公司持有的佛山某房地产公司股权。2013年11月12日至2013年12月23日，某信托公司通过信托财产保管账户向佛山某房地产公司转入6.75亿元并备注为股权投资。随后，佛山某房地产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将某信托公司登记为股东。

佛山某房地产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股东某信托公司认缴出资8.2亿元，实缴出资6.75亿元已于公司变更登记前缴足，其余1.45亿元在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但某信托公司以佛山某房地产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提供足额担保为由，在认缴出资期限届满前通过向第三方转让信托受益权的方式引入资金，与剩余出资款一并向信托委托人进行兑付，剩余1.45亿元认缴出资款至今未缴纳。

2022年7月6日，法院裁定受理某信托公司破产清算申请。陈某系佛山某房地产公司债权人，其以某信托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向某信托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未予确认，陈某遂起诉请求确认其破产债权。

####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陈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信托公司登记为佛山某房地产公司股东，即负有法定出资义务，应当向公司缴纳认缴的出资，否则将违反公司资本充实原则，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目标公司在履行投资协议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属于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同时，某信托公司在无法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由深圳某建筑公司以回购股权的方式取得投资收益的情形下，通过向第三方转让信托受益权的方式引入资金向投资人兑付信托收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对陈某的债务。遂改判确认陈某对某信托公司享有破产债权。

### 【典型意义】

某信托公司破产清算案系全国首例信托机构破产清算案，社会关注度高，本案为衍生的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对于厘清信托财产、固有财产和破产财产的边界，保障破产程序中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指导意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财产独立于信托受托人的固有财产，信托公司被受理破产清算后，因履行信托计划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较为复杂，相关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能够用信托公司的固有财产进行清偿，即突破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对于破产财产范围的认定和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具有重大影响。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相关规定，重点审查了信托公司在履行受托义务时是否存在违背管理职责或处理信托事务不当的行为，并坚持商法外观主义，确立了信托计划投资公司的债权人合理信赖利益的优先保护顺位，对类案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某基金合伙企业与何某、某证券公司、某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 【基本案情】

某基金合伙企业曾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起诉某医疗公司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股份发行认购协议》。该案生效判决查明某基金合伙企业已按照《股份发行认购协议》的约定，向某医疗公司转账支付了1499.96万元定向增发股份认购款，但某医疗公司未按约履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提交本次发行备案材料以及工商变更登记和股份登记手续等义务，构成违约。人民法院遂判决解除《股份发行认购协议》并由某医疗公司返还某基金合伙企业认购款1499.96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另查明，某医疗公司自2015年起至2019年均实施了虚增资产行为，其实际控制人何某等被追究刑事责任。某基金合伙企业知晓后，遂以证券虚假陈述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何某、某证券公司、某会计师事务所等赔偿其投资损失1499.96万元。

###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某基金合伙企业的起诉。某基金合伙企业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基金合伙企业诉请解除《股份发行认购协议》并返还认购款一案与本案并非基于同一违约行为而分别提起的违约责任之诉和侵权责任之诉，不构成责任竞合。某基金合伙企业与某医疗公司签订《股份发行认购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股份认购款，某基金合伙企业已履行完毕了认购股份的全部义务，其与某医疗公司之间开展了股份认购这一证券交易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其有权就股份认购中因某医疗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提起侵权赔偿的诉讼。遂裁定撤销原裁定并指令审理。

### 【典型意义】

本案系认定新三板挂牌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因未履行合同义务而解除合同后，仍应承担因其实施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侵权赔偿责任的典型案列。本案中，人民法院依

，合伙企业与某医疗公司签订《股份发行认购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股份认购款，某基金合伙企业已履行完毕了认购股份的全部义务，其与某医疗公司之间开展了股份认购这一证券交易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其有权就股份认购中因某医疗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提起侵权赔偿的诉讼。遂裁定撤销原裁定并指令审理。

### 【典型意义】

本案系认定新三板挂牌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因未履行合同义务而解除合同后，仍应承担因其实施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侵权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与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不构成责任竞合，投资人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支付认购款义务，即与挂牌公司进行了股份认购交易活动，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就其损失诉请实施了虚假陈述行为的责任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股份登记并非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纠纷的必要条件。本案通过依法行使审判权，准确厘清维权主体资格，有效威慑了证券市场中财务造假行为，有力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助推资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 杜某与某财产保险四川分公司、大连某服务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

### 【基本案情】

2022年5月15日，大连某服务公司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某财产保险四川分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记名雇员为杜某，工种为外卖骑手，保险期间为自2022年5月15日零时起至2022年5月16日二十四时止。雇主责任险保险单“特别约定”处载明：被保险人指定的雇员指接受某团等派发配送订单的骑手；被保险人雇员从事某团等配送相关的活动指被保险人雇员在某团接单后去取货、送货及配送返程期。

2022年5月15日19时42分，杜某接到保险合同指定的配送订单，20时23分完成送单。当日20时25分，杜某骑电动自行车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某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杜某无责。同日，经医院诊断，杜某软组织损伤（右手、左肘）、右手第四掌骨骨折、左桡骨小头骨折。2023年5月4日，北京某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评定杜某身体损伤为工伤九级。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某财产保险四川分公司支付保险金。

###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杜某的起诉。杜某不服，提起上诉。成渝金融法院二审认为，责任保险的第三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应满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赔偿责任确定且怠于请求两个条件。对于“赔偿责任确定”，不应仅以生效法律文书或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协商确定为限。杜某在案涉保险约定的配送订单期间受伤，经鉴定构成伤残，被保险人大连某服务公司对第三者杜某的赔偿责任能够查明，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能够确定的其他情形”。同时，大连某服务公司既未向杜某赔偿，也未向某财产保险四川分公司提出保险赔偿请求，属于“被

保险人怠于请求”的情形。故杜某有权直接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赔偿请求权。遂裁定撤销原裁定并指令审理。

### 【典型意义】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为应对新业态中的用工风险，用人单位往往投保短期雇主责任保险。通常而言，责任保险的保险金请求权应由被保险人行使，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确定且怠于请求的，第三者依法可直接行使。本案中，人民法院准确把握“赔偿责任确定”的条件，认定外卖骑手虽未就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取得生效法律文书或与被保险人就赔偿责任协商一致，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查明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能够确定的其他情形”，第三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请求权，不仅促进纠纷一次性解决，也有力保护了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 段某诉某信托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

###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5日，某信托公司设立案涉信托计划，到期日2021年11月20日，业务模式TOT模式（即以底层信托计划为投资产品），主要投资该信托公司2015年设立的另一信托计划。底层信托计划资金主要用途为向融资人发放信托贷款，用于其房地产项目建设。该底层信托计划于2018年12月20日到期，因出现逾期付息风险，经申请展期至2020年11月20日，后又展期至2021年11月20日。某信托公司推介案涉信托计划时，未向投资人披露该信托计划的投资产品即底层信托计划是否存在展期以及展期原因等信息。

2020年11月9日，投资人段某与某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认购案涉信托，信托资金300万元。信托合同约定信托财产如需司法诉讼等方式处置，则待程序完毕后进行清算、分配。2022年11月20日案涉信托计划终止。2022年11月23日，某信托公司发布信托清算报告，载明因底层信托计划项下融资人未按约归还信托借款，底层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需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处置，信托财产处置、变现后再进行清算、分配。案涉信托计划到期前，因融资人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某信托公司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后依法提起诉讼。2023年4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就还款安排、强制执行、风险控制措施等进行了约定。融资人归还了部分款项，某信托公司陆续对投资人支付了部分本金和收益。

2023年3月，某信托公司因案涉信托计划推介材料信息披露问题被行政处罚。2023年7月，段某以某信托公司未尽适当性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支付300万元本金及收益、资金占用损失等。

### 【裁判结果】

成渝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案涉信托计划为TOT模式，其底层信托资产的风险直接影响投资人对该信托计划的风险判断和收益实现。某信托公司在推介信托产品时未向投资人披露底层信托已出现逾期风险，违反了适当性义务，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一般情况下，缔约过失导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责任方应赔偿因合同未有效成立而产生的损失。但在金融产品销售领域，通常存在虽违反适当性义务但合同有效成立的“合同有效型”缔约过失，其损失确定原则上应以清算结果为基础。由于案涉信托计划清算尚未完成，且本案亦无证据



证明清算不能正常启动、推进或者已无财产可供清算等特殊情形，故投资人损失尚未确定，其可待损失明确后再主张权利。遂改判驳回段某的诉讼请求。

### 【典型意义】

本案系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及赔偿责任确定的典型案例。适当性义务是诚信义务在金融产品销售领域的具体化，目的是为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在充分了解相关风险的基础上作出自主决定，并承受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针对嵌套型信托产品，金融机构应主动、完整披露底层资产存在的风险，并通过区分缔约过失责任的不同类型，厘清了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赔偿规则，明确对“合同有效型”缔约过失的损失确定，原则上应以清算结果为基础。该案裁判对完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认定和责任承担规则提供了有益参考，有利于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强化信息披露义务，实现投资者与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保护的平衡，对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 刘某与王某某、某商业管理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 【基本案情】

某商业管理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登记股东（发起人）刘某、张某某，认缴出资额分别为990万元、1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99%、1%。某商业管理公司设立前，未签订发起人协议。某商业管理公司设立前后，刘某与王某某多次就商城招商、装修、经营范围、持股等进行沟通，直至同年12月双方仍就持股比例进行协商。同年12月25日，刘某与王某某指定的股权代持人李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某以350万元受让刘某持有的某商业管理公司44%股权，并于2019年1月9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某商业管理公司股东出资情况为张某某、刘某、李某分别认缴出资10万元、550万元、440万元，所占出资比例1%、55%、44%，备案登记的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0元。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期间，王某某共计向刘某转账3436937元。

此后，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某稽查局针对刘某股权转让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对刘某的股权转让行为作出处理和处罚决定。刘某认为与王某某不存在股权转让合意，股权转让仅是王某某出资到位后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行为，其已将王某某支付的340余万元以代付工人工资、房租、装修款等方式向某商业管理公司实缴出资，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王某某系某商业管理公司发起人股东。

###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发起人应当具备“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履行公司设立职责”三个法定条件，不能仅以公司设立前后的投资、持股等意向性沟通认定。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银行账户。在股东已认缴出资的情况下，其为公司经营产生的垫资应当认定为对公司的债权，未经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等程序，不能当然认定为对公司的出资。即使在公司设立阶段存在股权代持情形，也不能对抗股权登记的对外效力，包括通过股权转让显名而应承担的纳税义务。遂判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刘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公司股东要求确认他人为公司发起人的非典型股东资格确认案件。本案裁判明确公司发起人应具备“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履行公司设立职责”三个法定条件，有效厘清股东为公司垫资和股东出资的区别，对发起人股东资格认定的法律适用和出资类纠纷中实缴出资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同时，本案中，人民法院对公司股东意图通过确认股权受让方为公司发起人而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进行了否定性评价，以司法裁判方式对公司登记公示“内外有别”予以明确，有效发挥了司法裁判规范、指引市场主体行为的导向作用，有力维护了良好税收征管和市场经济秩序。

**王某某等28人诉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及第三人上海某银行买卖合同纠纷系列案****【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22日，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与上海某银行签订《动产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以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在上海某银行融资项下所有库存车辆及其合格证作为质押担保。上海某银行另委托某咨询管理公司对相关车辆及其合格证进行动态质押监管。2024年4月至7月，王某某等28名消费者与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定车合同》。合同签订后，王某某等28人按照约定支付了购车款，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交付车辆并开具发票。车辆交付后，因涉案车辆的合格证被上海某银行占有监管，导致王某某等28名车主无法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车辆无法上路行驶。王某某等28人遂诉至法院，要求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和上海某银行返还汽车合格证。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某等人自车辆交付时一并取得车辆及其合格证的所有权。经查，案涉车辆未实际移转占有控制，案涉车辆质权未设立。而银行虽基于合同关系占有汽车合格证，但仅占有汽车合格证不构成对车辆的质押担保。王某某等人在购车时并不知晓上海某银行占有汽车合格证，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亦未披露该事实，王某某等人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属于善意第三人，上海某银行对汽车合格证的占有未经公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判令上海某银行向王某某等人返还汽车合格证原件，并由重庆某汽车销售公司协助办理车辆注册登记。判决生效后，承办法官主动与当事人联系并进行判后答疑，并协调组织28名车主和上海某银行到庭集中交付汽车合格证，促使生效裁判得到主动履行。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高效化解汽车合格证返还纠纷，纾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典型案例。近年来，随着汽车金融、销售市场的波动，汽车经销商因融资压力过大出现资金链断裂，便将库存车辆合格证以作为融资质押担保为目的交由银行占有监管，导致售车后无法交付合格证，无法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频发。本案中，人民法院破除消费者与金融机构间无合同关系的藩篱，确立“金融机构的占有保护请求权不能对抗汽车合格证上的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裁判规则，对类案审理具有参考意义。同时，该案办理过程中严格贯彻立审执协调配合工作机制，通过“合并审理+示范判决+执前化解”方式迅速兑现裁判结果，避免产生大量执行案件，为创新高效实质化解群体纠纷模式，践行“如我在诉”的现代化司法服务理念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王某艳、王某辉与某养老公司、游某某服务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

2022年12月18日，某养老公司（甲方）与王某平（乙方）、王某平之妻游某某（丙方）签订《养老服务合同》，合同约定为了乙方的健康和安全，在乙方出现紧急情况时，有权在通知丙方的同时，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转送医疗机构，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或丙方承担；在突发疾病的情况下有权获得及时、必要的医疗帮助；乙方在入住期间突发疾病或身体伤害事故，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如需到医疗机构急救，在丙方不能前往甲方时甲方应派人陪送至医疗机构。甲方不能及时联系上丙方的，甲方有权自行采取措施（并约定以通知120急救为唯一措施）先行将乙方送外就医，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和丙方承担；甲方特别告知乙方或丙方，发生下列情况，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因病需要就医时，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应及时配合甲方处理相关事宜，因丙方不到场致使乙方得不到及时抢救而发生意外的。

2022年12月26日上午，王某平在某养老公司突发疾病，某养老公司工作人员电话通知游某某，游某某要求等待其到来后再做处理。游某某到达某养老公司处，王某平已死亡。王某平之女王某艳、王某辉认为某养老公司未拨打120医疗救护电话致王某平死亡，构成违约，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养老公司赔偿因王某平死亡产生的各项费用。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艳、王某辉的全部诉讼请求。王某艳、王某辉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某养老公司在通知家属后即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与养老机构负有法定紧急救助义务的立法精神相悖，亦违背生命至上、诚信友善的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无效。从合同其他条款内容来看，某养老公司对王某平负有约定的救助义务，能够采取而未采取拨打120等合理方式保证王某平获得必要的医疗救助，客观上延误了王某平救治的时机。其怠于履行法定和约定的紧急救助义务，应承担与其违约行为相当的赔偿责任。结合王某平的身体状况、某养老公司的实际规模以及收取的服务费金额、违约的具体情形等因素，改判由某养老公司向王某艳、王某辉支付违约赔偿金2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在当前养老机构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养老机构未合理履行对服务对象的紧急救助义务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以认定养老机构负有紧急救助义务为切入点，以生命至上、诚信友善为原则，认定养老机构仅向突发疾病服务对象家属履行通知义务即免责的条款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并确立了养老机构未采取合理方式保证服务对象获得必要的医疗救助，违反法定和合同约定的紧急救助义务，应对服务对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裁判规则。本案充分发挥了司法裁判在商业养老领域中对养老机构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指引作用，大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敬老爱老、救死扶伤的良好风气。

**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与重庆某实业公司、某建设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基本案情】**

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其公司股东包括重庆某实业公司、某建设公司。其中，重庆某实业公司出资比例为80%，某建设公司出资比例为20%。法院生效判决认定，重庆某实业公司存在抽逃出资和未如实履行增资义务的行为。重庆某实业公司自认无出资能力，案件处于执行终本状态。因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多次催告未果，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的监事依法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解除重庆某实业公司对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的股东资格的议案》。后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确认重庆某实业公司不具有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的股东资格，并协助办理股东除名的变更登记。

### 【裁判结果】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重庆某实业公司的抽逃出资和未履行增资出资义务的行为已经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且重庆某实业公司自认其已无出资能力；其次，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最后，重庆某实业公司未对决议效力提出异议，视为认可。同时释明，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出资。遂判决：确认重庆某实业公司不再具有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的股东资格；重庆某实业公司协助重庆某水电开发公司办理股东除名的变更登记。

### 【典型意义】

本案系通过司法裁判强化股东出资责任，保护资本充实原则的典型案列。本案裁判明确法院在审查公司股东除名的决议时，应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股东会议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同时，决议内容亦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并认定公司对抽逃出资且无补救能力的股东可依法解除股东资格，避免公司陷入治理僵局。同时要求公司及时办理减资程序或补足出资，防止因股东除名导致公司资本缺口，实现股东除名与资本维护的闭环衔接。本案通过司法确认股东消极资格，有效遏制“僵尸股东”现象，助力企业恢复正常运营，不仅彰显了司法对资本真实性原则的底线坚守，亦对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信用体系，引导股东诚信出资，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具有示范价值和指导意义。

## 重庆某商贸公司与重庆某物流公司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重庆某石油公司向重庆某银行借款共计1.742亿元，重庆某物流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21年4月，因重庆某石油公司未按约还款，重庆某银行要求其提前归还贷款，重庆某物流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催告未果后，重庆某银行提起诉讼，法院于2021年9月作出生效判决，判令重庆某石油公司应向重庆某银行偿还借款1.742亿元，重庆某物流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经多次转让，重庆某银行对重庆某石油公司、重庆某物流公司的前述债权最终转至重庆某商贸公司处且债权转让均已依法通知前述两债务人。

重庆某物流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其中，某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某处出资1950万元（占比65%）、重庆某加油站出资1050万元（占比35%）。2021年2月、4月，重庆某物流公司分别召开股东会，决定向股东分配利润100万元、2350万元。两位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得利润1592.5万元、857.5万元。2019年度审计报告显示，重庆某物流公司提取法定公积金超过当年利润10%，法定公积金总额低于公司注册资本50%。



202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重庆某物流公司提取法定公积金未到当年利润10%，法定公积金总额低于公司注册资本50%。2021年10月13日，重庆某石油公司破产清算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2024年7月23日，重庆某物流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被法院裁定受理。

后重庆某商贸公司起诉，以重庆某物流公司于2021年2月、4月存在违法分配公司利润2450万元影响其债权实现为由，请求撤销该利润分配行为并返还相关款项。

###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重庆某物流公司决议向其股东进行案涉利润分配前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提足法定公积金，且该利润分配系在明知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已有对外债务时作出。重庆某物流公司亦因资产不足以清偿前述对外债务而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重庆某物流公司违法分配案涉利润行为显著减少其责任财产，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其股东应当将违法取得的利润向公司返还。故依法认定重庆某商贸公司作为债权人申请撤销重庆某物流公司案涉利润分配行为的诉请成立，并判决某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某处、重庆某加油站将其违法分得的利润返还给重庆某物流公司。

###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否定公司通过违法分红转移资产，遏制“逃废债”行为，增强市场主体交易安全感，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本案中，公司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仍违反法律规定向股东分配大额利润，应认定该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权人撤销权诉请成立，股东应当将分得的利润返还公司。本案充分保护了债权人利益，并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审理类案提供了有益参考。法院通过裁判，依法打击逃废债，司法矫正悖信交易，营造诚信、法治营商环境。

## 重庆某航空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

### 【基本案情】

重庆某航空公司成立于2012年，为国有甲类通用航空公司，主要从事应急救援、航空摄影、城市消防等低空经济业务。自有7架飞机购买原值2.42亿，主要通过融资租赁和股东借款方式购买，占用了流动资金，增加了财务成本，导致公司常年处于亏损状态。之后，公司因资不抵债，重庆某航空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法院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管理人。

审理中，法院精准识别该企业具有重整价值：一是企业组织架构完备，运营团队尤其飞行团队稳定；二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在城市消防、航空护林等飞行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具有良好的行业前景，符合未来通用航空及低空经济发展方向；四是通过破产重整，有利于国有资产盘活，助力“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法院准许债务人继续营业，并指导管理人促成签订多项低空飞行服务协议，实现合同收入约5000万元，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后经债权人申请，法院于2024年1月25日裁定对重庆某航空公司由清算转重整。在投资人招募过程中，法院指导管理人采用“意向投资人承诺托底+市场竞争”的方式进行市场化公开招募，最终成功引入正式投资人，出价1亿元，超出意向投资2000万元。同年6月20日，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重整计划进入执行期间后，投资人按约支付了首期投资款且有部分职工继续在重庆某航空公司就职，债权按期清偿，企业生产经营稳定。

#### 【典型意义】

本案系司法精准助力“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的典型案例。重庆某航空公司系全市规模最大的通用航空公司、重庆低空经济“火种”企业。案件办理中，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助推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识别企业重整价值，努力实现对破产企业的“应救尽救”。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准许企业继续营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外地山火扑灭、《鸟瞰新重庆》航拍等重大项目，有效提高公司营运价值，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指导管理人运用“意向投资人承诺托底+市场公开竞争”的方式公开招募投资人，最终以高出托底投资款约2000万元成交，在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保护了重庆某航空公司的市场主体地位，并维持其运营价值。该案为拯救陷入清算危机但具有重整价值的企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重整经验。



## 利益衡量如何在民商事案件中展开？

来源：上海一中法院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5年4月10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qGumMaciUat4aV7acU0GGw>

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一个“目光之交互流转”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过程，这一过程又被称为“涵摄”。但是，法律条文的涵射范围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则是复杂多变的，“任何法律一经制定，就已经滞后”。故而，对于裁判者而言，应当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就是能够用有限的法律条文去应对无限的社会生活，用正确的法律方法去追寻、诠释法律背后的真义。在面对模棱两可的法律用语、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时，法官就像站在审判的十字路口，做出不同的抉择，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审判结果。这需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和协调，以便得出最优的裁判结论。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话题——利益衡量。

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是法官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黄金法则，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案件“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固有要求。但其本身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法律方法，对法官的法律素养、道德素养和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民商事审判实践中，利益衡量的适用条件是什么，如何进行利益衡量以及利益衡量的功能边界在哪里，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的问题。

### 利益衡量的适用情形

利益衡量理论主张，当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法官依据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进行比较衡量，通过实质判断确定需要保护的利益，然后再从法律条文中寻找依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和合理化。利益衡量的目的在于矫正机械司法所带来的弊端，防范利益显著失衡和价值偏差，从而避免明显不公正裁判结果的出现。该理论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02期）刊登的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就详细论述了利益衡量的具体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司法过程中普遍都存在着对各方利益的衡量，但作为一种方法和价值判断，利益衡量并非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会得到适用，其适用具有严格的场景和条件。利益衡量可分为两个层次，即立法上的利益衡量和司法上的利益衡量。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立法本身就是制度衡量的结果，而这种衡量又会通过所谓制度利益表现出来，此即“第一次利益衡量”。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法释〔2023〕1号）明确，在多个债权人就登记在开发商名下的房产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以满足居住为目的的购房人的权利优先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抵押权、普通金钱债权而获得保护。该批复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目的，并参照《民法典》第四百零四条有关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登记查询豁免的机理，进行充分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后作出的解释，利益衡量的基础就是生存权是高于其他一切的权利。因此，在司法裁判中，如果立法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利益衡量和安排，法官应当首先遵循这种利益安排，而不存在利益衡量的空间。

司法上的利益衡量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

► 一是涉及法律原则、一般条款或者不确定法概念的适用。《民法典》中有大量的原则性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私法自治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以及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性法概念的适用要件均欠缺清晰界定，需要进行法律解释和不确定条款的价值补充，以选择最合理的准则解决利益冲突。

► 二是涉及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出现多解或者复数解释。在成文法中，法律规定可能存在复数解释的情况，法官需要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以取舍选择最合理的解释。

► 三是涉及法律漏洞或空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法官的职责决定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即使存在法律漏洞，法官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裁判。而利益衡量是应对法律滞后性的有效方法，在充分查明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对不同利益进行评价、确认和分配，能够实现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

比如，体外冷冻胚胎的归属问题属于新类型疑难问题，必然涉及到多方利益，理论和实践中不无争议。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借助利益衡量方法进行分析论证，可以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和公众接受度。

► 四是涉及利益冲突。如果法律未对某些利益冲突之情形作出安排，或者是某些两两冲突之利益受到法律相当程度的保护，那么这种利益冲突就属于法律规则无法自行消解的情形，需要法官进行利益的权衡和取舍。我们发现，那些各方存在较大争议、权利冲突激烈且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处理中常常需要法官依法进行利益衡量。

比如，在审理涉及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个人权益的名誉权纠纷案件中，需要法官在个案中审慎把握，既要保护个人权益，也要防止司法对学术问题、言论自由作出不当干预，要在多个利益之间进行合理界分。

► 五是涉及酌定情形。在民商事审判中，法律在很多领域赋予法官自由裁定的空间，比如对于当事人之间责任比例的划分、违约金或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等，虽然现行法律有时规定了可供酌情参考的各项衡量因素，但个案中还是需要法官综合衡量各方利益后作出裁判。

► 六是个案机械适用法律将导致明显不公。在少数例外情形下，虽然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将法律规定适用到某一个案中会导致明显的不公，此时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

总之，如果现有的法律条文已经足够清晰、无争议，则利益衡量的适用空间较小，只有在法律规范过于原则、存在法律漏洞或者立法存在滞后性、权益存在冲突等时，才会涉及对利益衡量的适用。

### 法官在审判中进行利益衡量的方法

利益衡量理论是在评判传统法学及概念法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法学方法论，其实质是一种裁判中的思考方法。众所周知，传统的三段论的裁判过程是先查明案件事实，再找到对应的法律规范，然后通过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推理获得判决结果。而利益衡量方式更注重对个案的实质正义的追求，主张法律体系本身并非是逻辑自洽的，法官也并非机械地适用法律，裁判也不是根据法律规范来自动推断判决结论的过程。恰恰相反，裁判的过程是当面临各种利益冲突时，首先根据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及利益衡量的方法得出妥当的结论，然后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找最适当的法律规范，通过对法律规范的解释，论证其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理由，从而在一般规范与具体案件之间架起桥梁，以证明裁判结果的妥当性。

据此，利益衡量的过程可分为实质判断+法律证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围绕利益的分析、衡量进行

实质判断，形成基本理由，从而得出结论；第二个阶段是为结论找到法律依据，即更强理由，令结论合法化。具体操作中，可细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 一、确定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

法官首先需要明确案件中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原告、被告以及可能受到案件影响的其他相关方。然后，要仔细倾听各方的利益诉求，了解他们所主张的权利和利益的性质、范围和依据。这是进行利益衡量的基础，只有准确把握各方的利益诉求，才能进行有针对性地分析和判断。

### 二、查明案件事实

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是法官进行利益衡量的前提和基础。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本身就是通过利益衡量做出的价值判断，如举证责任分配、对事实的推定等。在查明事实的过程中，法官要保持中立和客观，不受任何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同时，法官还要对证据进行认真地审查和判断，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只有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对各方的利益进行准确地评估和衡量。

### 三、识别各方利益

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法官应当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识别和分析，通过对各方利益的梳理，可以明确利益冲突的焦点和关键问题。对于一些不正当的或者与案件无关的利益予以剔除，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筛选出重要的、值得考虑的利益。

要充分而完整地分析关涉各个利益层级的利益种类，既要厘清核心利益，也要注意社会问题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根据梁上上教授的理论，利益呈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在纵向上，利益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在横向上，可分为支持原告的利益，支持被告的利益，支持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支持国家、社会作为抽象主体的利益。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以当事人的具体利益为起点，考虑同类案件中同类当事人的群体利益，进而考量案件类型化形成法律制度后的制度利益，最终衡量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得出妥当的结论。

比如，在处理食药领域职业打假人主张惩罚性赔偿案件中，法官不能仅仅将视线落在经营者和职业打假人双方的利益上，还需要重视同类案件同类当事人的群体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背后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食药领域社会公众健康和安全这一社会公共利益的因素。

### 四、进行实质判断

在识别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法官需要进行利益的取舍和调和，这是利益衡量的关键环节。在诸多利益之间进行衡量时，应当先对诸利益的优先程度和分量进行估算；当价值之间出现冲突时，应当对价值进行判断，最终确定在待决案件中选择的价值取向。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方法：

#### （一）权利位阶分析法

利益本身可以分为不同位阶，确立价值优越性即利益位阶，位阶高者自然要优先保护。具体而言，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一般应确认社会公共利益的位阶高于个体利益，比如环境资源与保护、社会保障与救济等公共议题上，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而在个体利益相互之间，基本利益要高于具体利益，如人身性权利大于财产性权利，言论自由要高于经济利益。

✧ 例如，在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同在此次事件中



受害，但李萍、龚念一家是在实施有利于五月花公司获利的就餐行为时使自己的生存利益受损，五月花公司受损的则主要是自己的经营利益。二者相比，李萍、龚念受到的损害比五月花公司更为深重，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受损结果，酌情由五月花公司给李萍、龚念补偿一部分经济损失。

## （二）比例原则分析法

比例原则的本质是权衡方法，其旨在权衡所有利益及价值冲突，强调的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比例性或均衡性，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应当兼顾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目标而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应将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并保持二者之间适度的比例。在民事案件中，往往牵涉多方平等主体间的法益，引入比例原则可以保证各方的利益得到平衡和保护，避免单方权益过度受损的情况。司法实践中具体可以关注考虑以下几点：

### 1. 哪种利益受影响的程度更高，从而决定对哪方予以保护

例如，在因犯罪分子利用借记卡制作成伪卡并盗刷的行为引发的储户诉银行借记卡纠纷案件中，由于银行具有更强的经济、技术、法律能力可向有关责任方追偿，与持卡人相比较，更容易获得类似本案伪卡交易损失的成本、频率和原因等详细交易信息，因此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损失和预防损失。从保护储户作为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理念出发，通过对银行和储户双方的利益衡量，从伪卡盗刷所产生的损失分配、处理和预防等方面来看，让银行先行向储户承担违约责任更具有合理性。

### 2. 对哪种利益保护更具有紧迫性

要看冲突的利益对于双方当事人的紧迫程度，紧迫程度大的利益更需要得到司法保护。

例如，在无锡首例冷冻胚胎案中（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案件之一），二审判决指出，涉案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亦可适度减轻其丧子失女之痛楚，在沈某某、刘某某意外死亡后，其父母不但是世界上唯一关心胚胎命运的主体，而且亦应当是胚胎之最近最大和最密切倾向性利益的享有者，最终生效判决确认涉案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

### 3. 选择保护哪种利益能使相对利益的损害程度最低

比如，在股东请求查阅会计凭证的案件中，法官应当对股东查阅理由与查阅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赋予股东的查阅范围应当与其查阅目的相匹配，以确保对股东的知情权保护力度与对公司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合乎恰当比例，而非简单地对股东的查阅请求予以全部准许。

又如，股东加速到期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实现个别清偿，是对股东认缴出资在特定情形下的一种例外和突破，但是在公司进入破产的情形下，如果允许个别债权人通过主张股东加速到期的情形实现个别清偿，将有损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因此在公司破产的情形下，个别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劣于公司全部债权人的利益的保护，即便股东应当加速到期，产生的相应责任应当作为公司财产，由全体债权人基于法律规定进行参与分配。

### 4. 利益并存时，可否使其各自实现一部分

在合同纠纷中，法官需要权衡合同双方的利益，既要保护合同的严守原则，又要考虑到实际履行的可能性和公平性。当一方违约时，法官需要根据合同的约定、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实际损失等因素，来确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范围。在侵权纠纷中，法官需要平衡侵权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



赔偿数额，既要使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又要防止赔偿数额过高导致对侵权人的过度惩罚。

比如，自消费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以来，对于职业打假人是否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备受争议。支持其合法性的一方认为，“职业打假”具有规范和净化市场的正面效应，保障食药领域的公众健康；反对方则认为，“职业打假”“知假买假”已经异化成不劳而获的牟利手段，浪费有限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资源，应予遏制和打击。两种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在中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的点。因此，在判断是否支持职业打假人的惩罚性赔偿要求时，应该将经营者主观过错、损害大小、行为危害、获利情况、采取补救措施等作为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考量因素，构建“罚过相当”的消费惩罚性赔偿制度。

#### 5. 实现各方利益整体上的最大化

某种意义上，一个最优的判决应是各方利益总体意义上的最大化。利益衡量的总体目标追求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群体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各方博弈中，法官应当要寻找一个平衡点，通过个案的判决从而使社会资源在整体上实现最佳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

这就要求法官在判案过程中遵循这样一种思维过程：以当事人的具体利益为起点，在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联系群体利益和制度利益，特别是对制度利益进行综合衡量后，从而得出妥当的结论。

比如，实践中对于没有取得经营许可而引发的合同类纠纷，法院并不当然认定合同无效。因为相比于一概否定合同效力，认定合同有效的做法更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的良好稳定运行，合乎比例原则和司法的谦抑性质。

#### （三）价值衡平判断法

人类活动总是在社会共同体中进行，而为了维系这种共同体关系，社会共同体会在一定程度上达致一定共识。这些共识可以从法律适用中需要遵循的法秩序上的基本价值、利益本身的位阶秩序以及法律主体行使权利需要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来考虑，这三个视角共同构成了利益衡量的价值判断基础。

因此，衡量的结果妥当与否，应当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念所认同，个案进行利益衡量时要关注社会的主流价值判断、道德感、公众舆论、社会效果等因素。一旦发现某一裁判尺度可能有违基本常识，我们要反思是否在某一逻辑推理环节出了问题，从而主动校正，在逻辑和价值的互动中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 （四）进行法律证成+心证公开

梁慧星先生在论述利益衡量的时候指出，“作为法律解释学方法论的利益衡量论，并不主张法官仅依利益衡量裁判案件，而是在进行利益衡量得出初步解释结论后，还须进一步寻求根据，用现行法上的根据验证自己的初步解释结论，确定其范围，并增强说服力”。法官在利益评估后得出的实质判断并不能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接下来还需找到能够支撑实质判断或能够与实质判断相互验证的法律条文。如果在作出实质判断后无法找到能够支撑、验证实质判断的法律条文，此时实质判断将难以做到合法化，也将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种情形，应当检讨实质判断是否正确，考虑重新进行实质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质判断的基础上结合法律条文，并不是将实质判断与法律条文机械地结合、简单地叠加，而是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等方法，使法律的适用更加合理和恰当。

∴ 例如，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案件（该案被写入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对于养育母亲对代孕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的认定，在面临立法空白的情形下，二

审法院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确定了未成年子女利益优先保护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对“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进行了扩大解释并适用于该案，完成了法律路径之求证，从而使判决结果更具有妥当性和合理性。

此外，法官在裁判中应当进行充分说理，展现其心证过程，详细论证利益衡量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以增强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

### 利益衡量的功能边界

利益衡量有助于法官审理疑难案件，却又带来了新问题，即如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实践中，法官必须谨慎地使用利益衡量方法，并应严格遵循利益衡量的功能边界。

#### 一、利益衡量不得违背基本的法律逻辑

利益衡量不能脱离法律框架，否则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利益衡量的对象必须是法律予以确认和保护的利益，是合法利益之间发生无法自行消解的冲突；二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则作为依据，以使裁判获得正当性。对于法律规定存在不明确、不周延或者滞后的情形，要运用法律解释的方式予以弥补，最终以证明裁判结论的妥当性和合理性。

#### 二、利益衡量不得背离立法的意旨

立法是有目的的活动，利益衡量要求司法者去发现法律，找到法律条文背后的真义，并以此为指引来衡量利益分配。在利益衡量中，要充分考虑法律的目的、精神和价值，避免在判断利益关系，取舍利益的时候，出现与立法者价值取向相违的选择。

比如，在判断合同效力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时，要在考察规范性质、规范目的以及规范对象基础上，权衡相互冲突的法益类型，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将法律规范所保护的法益和合同自由之间进行利益衡量进而判断合同效力。

又如，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纠纷案件的处理涉及到公司经营自治权与中小股东退出权之间的平衡问题，在适用公司法规定救济中小股东退出权益时不应过分僵化理解法律文义，关键要看公司事实上是否存在“连续五年未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这一实质内容，要结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即保障中小股东退出公司的权益来作出判定。

#### 三、利益衡量不得偏离基本的价值判断

利益衡量的实质是从法律之外的视角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利益衡量不能脱离社会的朴素认识，不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融入裁判文书以及其指导原则、适用范围、适用方法等进行了全面规定，其中就涉及利益衡量效果的要求。比如，在哪些案件需要引入核心价值观，指导意见明确了有关涉及国家利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涉及抢险救灾、英烈保护、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助人为乐等，可能引发社会道德评价的案件；涉及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以及特殊群体保护，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涉及公序良俗、风俗习惯、权利平等、民族宗教等，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涉及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对法律规定、司法政策等进行深入阐释，引领社会风尚、树立价值导向的案件。

上述领域的案件往往都是因权利冲突而要求司法机关必须进行利益衡量的案件。备受关注的“电梯劝阻吸烟者猝死二审案”（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3-07-2-001-001）以及“行李箱绊倒老人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4256号】中，法院最终的判决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就在于法官能够在个体权利激烈冲突中准确衡量值得保护的价值，并根据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共识来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因此，法官在对具体个案进行审理时，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考量，并将这些因素作为利益衡量的重要依据，要注重裁量的结果是否与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普遍理解相契合，以期获得积极的社会效果。

#### 结语

利益衡量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要通过引入实质判断的思考方式，从案件事实中查明冲突的利益，通过独特的衡量方法，以实现各方利益的总体最大化，从而实现案件“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在此过程中，为防止法官恣意，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法定程序，作到过程合法、结果能经得起历史检验。

## 应收账款被抢先登记，征信机构有责任吗？

来源：上海金融法院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5年4月28日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S75iiup1spSXTyRgwR77\\_w](https://mp.weixin.qq.com/s/S75iiup1spSXTyRgwR77_w)

明明在先签订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结果发现有三笔应收账款被抢先登记，应收账款权利人认为，征信机构在他人未提供质押合同情况下即作登记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对此，征信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担责？

近期，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判决了一起应收账款权利人以某征信机构未对质押登记尽到审查义务致登记错误为由提起的其他侵权责任纠纷案，认为征信机构作为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机构，系通过数字登记公示系统为社会公众提供查询服务，其对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申请的审查方式为形式审查，申请人是否提交质押协议及其内容真实性并非征信机构的审查范围。

### 【案情】

2019年11月13日，某工贸公司（质权人）与某租赁公司（出质人）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应收账款以合同所附清单为准，即：……2.湖南某立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3.北京某控工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4.广东某升置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2019年12月6日，某工贸公司在某征信机构办理《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初始登记》，载明出质人为某租赁公司，质权人为某工贸公司。质押财产附件为“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某工贸公司”。

2019年12月5日，某商行（质权人）与某租赁公司（出质人）分别签订三份《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其中质押权利清单分别载明：应收账款债务人为广东某升置业有限公司、湖南某立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某控工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贵州某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某凯航空有限公司等，并均载明了应收账款对应贸易合同编号、应收账款金额和到期日。当日，某商行在某征信机构分别办理五笔《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初始登记》，均载明出质人为某租赁公司，质权人为某商行。质押财产描述分别为：某租赁公司与某凯航空有限公司、贵州某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及其附件项下之租赁债权，其他三项同某工贸公司（质权人）享有的前述2、3、4项《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权利。上述合同均无质押财产附件。2023年9月，某商行就上述质押登记办理了展期登记，亦无质押财产附件。

某工贸公司诉称：某商行在未签订质押合同情况下，将已经质押给其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账款，登记在某商行名下，侵犯某工贸公司的优先受偿权和同等受偿权。某征信机构在申请人未提交质押合同情况下对外公示质押信息，亦侵犯某工贸公司的上述权利。某商行、某征信机构均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故诉请判令某商行、某征信机构撤销其错误作出的由某商行登记的应收账款质押初始登记及相应展期登记。

某征信机构辩称：其非适格被告，与某工贸公司和某商行的应收账款质押纠纷无直接关联。其不存在主观过错、不存在错误登记行为，未实施侵权行为。案涉质押登记真实性、合法性由某商行负责，其无义务撤销某商行提交的质押登记，应当由登记办理人自行申请注销。某商行质权先于某工贸公司设立，某征信机构



未侵犯某工贸公司优先受偿权。

某商行辩称：其系在已签订质押合同情况下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并未侵犯某工贸公司优先受偿权，质押给某工贸公司、某商行的底层资产不存在重复质押的情况。某工贸公司应当明知应收账款质押权利设立需依法办理登记，其怠于办理登记产生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某租赁公司述称：不清楚某租赁公司与某工贸公司、某商行具体业务时间节点，以其出具的盖章文件为准。

### 【裁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工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工贸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某商行提供的与在先登记的三笔应收账款质押所对应的三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上述合同的落款日期均为2019年12月5日，某工贸公司认为合同实际签署于2019年12月7日凌晨，但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某商行存在恶意抢先登记的主观故意。某工贸公司认可其未对另外两笔应收账款办理过质押登记，举重以明轻，某商行亦对另外两笔质押登记没有侵权故意。

在此基础上，就某征信机构公示案涉五笔质押登记是否侵犯某工贸公司的相关权益，上海金融法院认为：

第一，某征信机构通过数字方式审查并公示的质押登记，相关内容本身是真实的，故其所公示的内容亦产生社会公信力。

第二，“未提交质押协议”并不足以影响某征信机构公示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根据质押登记时适用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四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某征信机构通过数字方式进行审查的程度仅为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虽然当时适用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质权人应将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协议作为登记附件提交登记公示系统”，但该规定仅是在形式上规范质权人的申请登记行为，以确保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并未规定质权人“未提交质押协议”以及某征信机构未审查质押协议的法律后果，故该条在实质上并不否定“未提交质押协议”情形下某征信机构公示登记行为具有合法性，进而也未否定某征信机构公示行为的效力。

第三，作为质权已实现的质押登记应由质权人申请注销，而非由某征信机构主动撤销。某征信机构虽享有撤销相应质押登记的职权，但其前提是当事人的要求，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的要求，故某征信机构行使该项职权应当是被动的，即其是配合当事人或者法院、仲裁机构而为之，而非作为行权主体主动作为。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评析】

为顺应应收账款融资发展的现实需求，我国建立了动产融资统一公示系统这一数字登记、公示平台，将应收账款质押、应收账款转让、融资租赁等动产担保的登记和查询服务进行了整合与统一。但随着相关登记数量的与日俱增，实践中产生了登记机构对于该类登记应否审查、如何审查，以及审查责任的争议。

#### 一、审查方式

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看，某征信机构不负有对质押登记的实质审查义务，但该条未明确某征信机构是否负有审查义务抑或形式审查义务。我们认为，某征信机构应当对质押登记进行形

式审查，而非不负有审查义务。

事实上，某征信机构通过动产融资统一公示系统的创建，利用系统数字校验规则（如内容格式拦截等）已构成形式审查技术载体，如权利人填写内容不符合校验规则，则无法通过核验。此种审查方式不仅确保了登记效率与标准化，亦符合国际营商环境对公示制度的技术理性要求。

## 二、审查程度与范围

形式审查一般指登记机构仅就当事人所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校验，不含物权状态的调整与调查。目前而言，某征信机构仅需审核担保方信息、登记期限及财产描述即属于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过度审查将导致成本转嫁至出质人，因登记错误亦可被债务人以抗辩推翻，不影响权益实质。故无需对某征信机构的数字审查提出超过形式审查标准的更高要求。

## 三、归责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我国侵权责任以过错责任为原则，以无过错责任为例外，适用无过错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在质押登记审查领域，法律并未规定适用无过错或者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此，仍应由“受害人”举证某征信机构在公示质押登记时未尽到注意义务而存在过错。

###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条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